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日〕山田贤 著 曲建文 译 卿学民 刘景文 审校

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

移住民の秩序

移民的秩序

——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

「日」山田贤 著

曲建文 译

卿学民

刘景文

审校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 (日) 山田贤著；曲建文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2

ISBN 978-7-5117-0749-9

I. ①移…

II. ①山… ②曲…

III. ①社会发展史—研究—四川省—清代

IV. ①K29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3276 号

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郑 锦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66509236 (总编室) (010) 66509353 (编辑部)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E-mail edit@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49 千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

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

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 年 5 月

译者序

“湖广填四川”在中国移民史上是极其浓重的一笔。

遥想当年，“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四川通志》）。四川的经济在唐宋时期即居于全国前列。尤其南宋时，该地人口占全国的 23.2%，财赋收入乃至供应的军粮都为整个南宋的三分之一，因此而成了抗金的主要经济基地。但长期的拉锯战，使得“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吴昌裔疏）。元末，红巾军徐寿辉的部将明玉珍入蜀，不仅带去了十几万军队，更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入蜀开垦荒地——这应是“湖广填四川”的演练吧。明初，湖广移民继续大批入川，至洪武十四年（1381 年），四川人口已上升到 146 万。不幸的是到了明末清初，四川境内又遭战乱。顺治十五年，率军赴四川镇压张献忠的清军将领李国英，派幕僚刘达到西北购买战马。一个多月之后，刘达返回四川时，沿途的情景令他吃惊不小。他写道：“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

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兵燹加上灾荒、瘟疫，导致四川的人口锐减，据统计，清初仅存 76980 丁（不含老幼和妇女），有说约存 50 万人——总之，以荒无人烟来形容似不为过。面对此种惨状，清王朝于顺治末年实施优惠政策，如抛荒土地任凭耕种、永占为业、减免赋税等；一方面发给川民逃亡外省者路费，鼓励他们返籍，一方面重奖移民入川。于是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地涌入四川，长达百年的“湖广填四川”由此拉开了大幕。“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嘉庆年间流行于成都地区的这首《竹枝词》，形象地写照了四川历史上多次移民的状况。

以上构成本书的大背景，所探讨的是 17 ~ 18 世纪自中国长江中部流域（湖广）向长江上游地区（四川）的人口流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四川地域社会秩序的形成及整合过程。作者把目光聚焦于极具典型意义的川鄂陕三省交界地带的川东地区，并且亲临地处川东的云阳县，进行实地解剖。感性认识加上理性思考，使得本书的论说如庖丁的手中刀，爽利而游刃有余。

地域社会“秩序”的形成及整合过程，无疑是本书的着力所在。作者把这个过程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同乡聚居”——移民的流动通常以数口之“家”为单位，与语言、习俗相同的同乡出身者聚居而成同乡村落；第二阶段是形成“宗族”——在同乡聚居地区成长起来的有实力的同族集团，脱离同乡聚居而向同族聚居的形态转化，成为体现传统社会生活理想的组织；第三阶段是地域精英参与公权力——有实力的宗族之间结成紧密的社会关系，并以此为背景，逐渐增强对州县行政的影响力、发言力。

与上述过程相伴而来的是，由强大的整合压力而导致的在

地域内部孕育的反整合运动——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白莲教起义，乃至红灯教起义。这种社会大动荡的成因，并非天然地萌芽于“移民”之中，而是来自于在移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矛盾。也就是说，造反的主体并非先天地对立于定居者的“共同体”之外，而是在地域社会开始向某种秩序统合的进程中，由其内部析出的。具体地说，同族集团的发展，呈现出两个趋向：一是拥有宗祠、族谱、山寨等的宗族组织；一是经济基础遭到侵蚀、同族的结合面临危机的集团。乾隆年间的后半期，在云阳县县北的地域社会中，有实力的移民氏族通过占有土地、商业交易获取垄断性的利益，逐步得以壮大；与之同时，也孕育出了白莲教造反集团。作者写道：“应把白莲教造反集团的析出和有实力的移民氏族（移民地主）的生成作为相辅相成的两极来加以理解。使得云阳县的白莲教军登场，而且自始至终都成为极难对付的对手的，只能是县北的移民地主。”

史载，乾隆十四年（1749）四川的“人丁”为二百五十余万，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则突破了九百万。乾隆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大批流民陆续聚集于川楚陕交界地区谋生。该地区为山岳老林所覆盖，历来是失地流民的聚集之所。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川楚两省饥民来此觅食者达数十万。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总数不下百万。该地区土地贫瘠，气候恶劣，更有大姓豪族的压制盘剥和差役胥吏的欺凌勒索，其生活之艰难可知。绝望中的流民，自然成了白莲教疯长的乐土。嘉庆元年（1796），一直以来传播于民间的白莲教的性质发生了重大转折：白莲教首领刘之协提出了“反清复明”、“官逼民反”等口号。从此白莲教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并成为此后白莲教共同遵循的原则。这年春天，白莲

教终于揭竿而起，参加者主要是山民、棚民以及长江水手、手工业者、无业游民；其中坚，据说就是移民。自嘉庆元年算起，白莲教的这次造反历时九年多，其间占据或攻破州县达204个，灭了不少清军，并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大员二十余名。九年多的岁月里，清王朝消耗军费2亿两，相当于4年的财政收入，使得清王朝元气大伤，从此开始走向衰落。

然而白莲教起义的被镇压，不是清王朝噩梦的终结。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列强的疯狂侵略和清王朝推行卖国政策，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此背景之下，四川的红灯教起义又继之而起。红灯教与四川的民间秘密宗教和会党组织声气呼应，把反清与反帝紧密结合起来，喊出了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作者把它定性于反地域精英的运动，认为“红灯教的造反，是在现存体制的秩序动摇或空洞化之中，以作为体制性秩序中坚的清朝公权力、地域精英层的背信弃义为发端，广大的非精英层将自己定位于‘中心’位置，试图亲手实现传统的、正统的秩序的运动”。说到底，实则乃为白莲教起义的余绪。作者通过比较研究——包括思想、信仰、仪礼、教义乃至教派等，深入透析了白莲教与红灯教之间的渊源及异同，为的是通过对红灯教的分析，描述急剧的地域整合与反整合之后出现的地域社会的新面貌。这个新面貌的实质，就是移民社会的终结。其标志就是公局—绅粮体制的确立。

在历史研究领域，关于国家秩序与地域秩序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没有形成一个倾向性的意见。作者将众说纷纭的观点归纳为三种类型，并指出：“历代中国王朝的国家体制，不是将流动人口排除在外，而是作为中心，具有笼络在其统治末梢不断生成的‘秩序’的机能。”封建王朝没有对人口的移动以

及从中析出的地域精英抱有敌视态度；相反，王朝国家起到了作为不断给予地域精英和以之为核心的地域秩序以“正统性”的象征作用。在清末的四川，由以地域精英为核心形成的公局—绅粮体制，所体现的正是完善或加强“无所不及地渗透地域的封建王朝一元化统治”。

至此，作者完成了他关于“移民的秩序”的学术之旅。随之一路行来，所见资料的坚实丰硕、论辩的细密通达，都令人读之无倦、忘乎所以。

我国学术界对清代四川移民问题的关注在 20 世纪初即已开始，其中名家如谭其骧、顾颉刚、罗尔纲、窦季良等已有不少珠玑之见。自此以来，关于这个课题的讨论文字，更是汗牛充栋，而本书的研究成果乃至治学精神，必将为识者所重。

2008 岁末

前 言

16 世纪以后，中国发生着某种“异变”。这种“异变”，就是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进行着的人口增长。这种人口的变化，毫无疑问与同时代如洪峰般铺天盖地的银流通（新大陆的白银通过西班牙向欧洲大量流入，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因此对于其内部结构的分析，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研究课题了。中国大陆突如爆炸般膨胀的人口，经过此后的几个世纪，不仅充实了周边未开发地区，甚至作为“华侨”涌向海外，开了移民的先河。

然而，近年来的研究结果，却在证明着这种人口增长的“异变”不仅仅表现在中国，而是东亚世界所共有的现象。例如 15～17 世纪的朝鲜，17 世纪的日本，也都是人口增长的时期。不过以日本的情况来看，至 18 世纪时，人口增长的趋势已异于中国，即过渡到微增的时期。也就是说，现在日本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很明显是由于 18 世纪以来，通过有意识地控制出生率以维持人民的生活水平、采取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集约化方式，以消解人口增长的压力的结果。如果说近代日本社会在 17 世纪之前解决人口增长的方式是向心式、内敛式的话，那么清代中国则是以外延的不断膨胀、

扩大的方式——通过持续不断的人口迁徙，即所谓“移民”的方式来化解人口增长的压力。何以会产生这种机制上的差异？对此问题，只能期待于两者比较研究的深入了。在此，对体现着清代中国社会特征的诸事像——行政体系、生态系统、地域精英、“造反”等加以考察的话，我们再次确认，将人口急剧增长的趋势与移民问题同时纳入视野而形成多角度的论题，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所涉及的研究范围限定为：探讨 17 至 18 世纪自中国长江中部流域（湖广）向长江上游地区（四川）的人口流动，和随之而来的四川地区社会秩序的形成以及整合过程，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内部所孕育的分裂——称之为地域动荡的“造反”。其用意，不过是试图通过截取与“大爆炸”同时开始的汉民族居住区大规模膨胀过程中的一个小的部分，从微观的视角进行还原，以反映出一个地域的简史。那么，为什么选择四川作为剖析的地域呢？四川自古以来就得到了开发，但在明末，据说因张献忠之乱而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土地重归于荒芜状态。尽管目前还没有能够提供当时四川人口减少到何种程度的可信史料，但可以推算，清初四川人口的总数不到 50 万人。如果考虑到清末四川的人口超过了 4000 万这个事实，那么把清初的四川想象为几乎是渺无人烟的广袤荒野也不过分。由于偶发的原因（张献忠之乱），清代的四川具备了所谓原住民人数锐减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移民在空白状态中（当然还不能说是纯粹的“空白”，但与四川所有其他周边地区的移民社会相比，四川更接近于这种状态）创造出来的传统中国的“地域”，如何收拢归一并形成秩序？在其过程之中又产生了怎样的碰撞？可以说，这里成了一个验证上述问题的大实验场。

因此，四川移民社会的还原工作，为我们提供了清代周边地区因人口迁徙而时常出现的整合与反整合（造反）这一过程的地区性实例。与此同时，对于解开传统中国社会是如何由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凝结而成的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另外，本书也为对“部分”四川地域社会进行验证并得出答案提供了条件。

山田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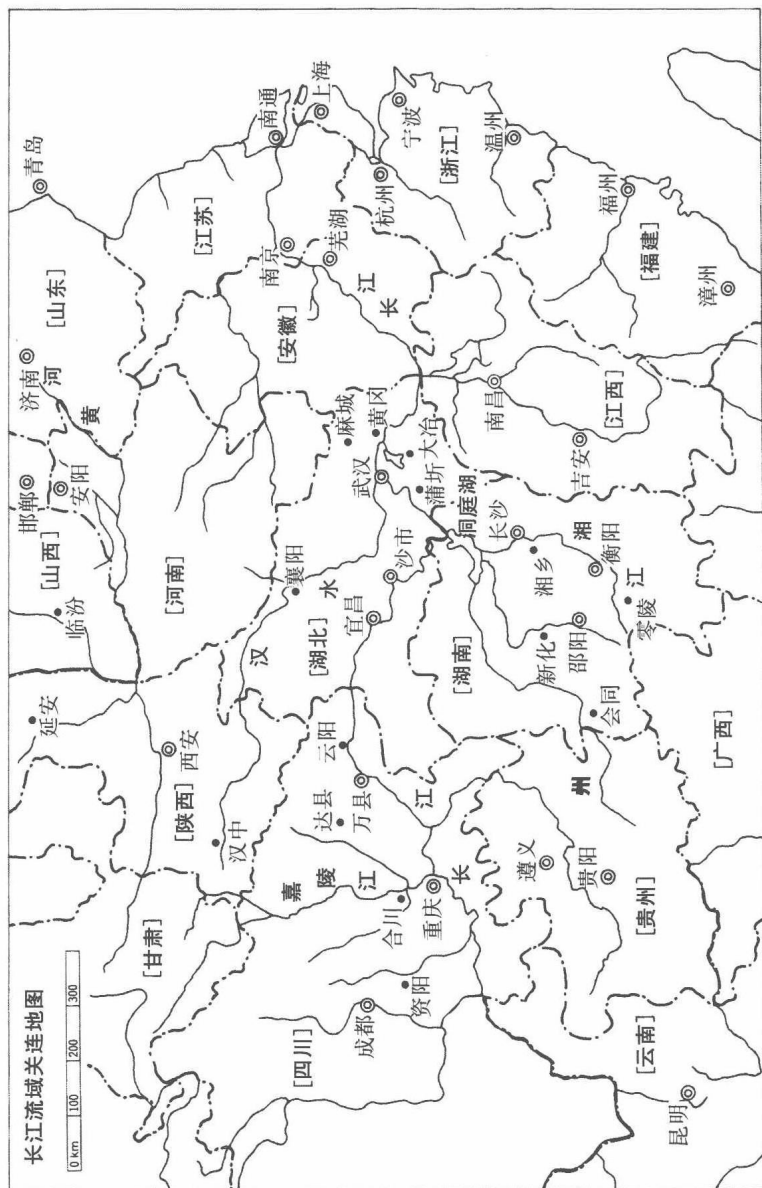
山田贤

1960 年生于日本爱知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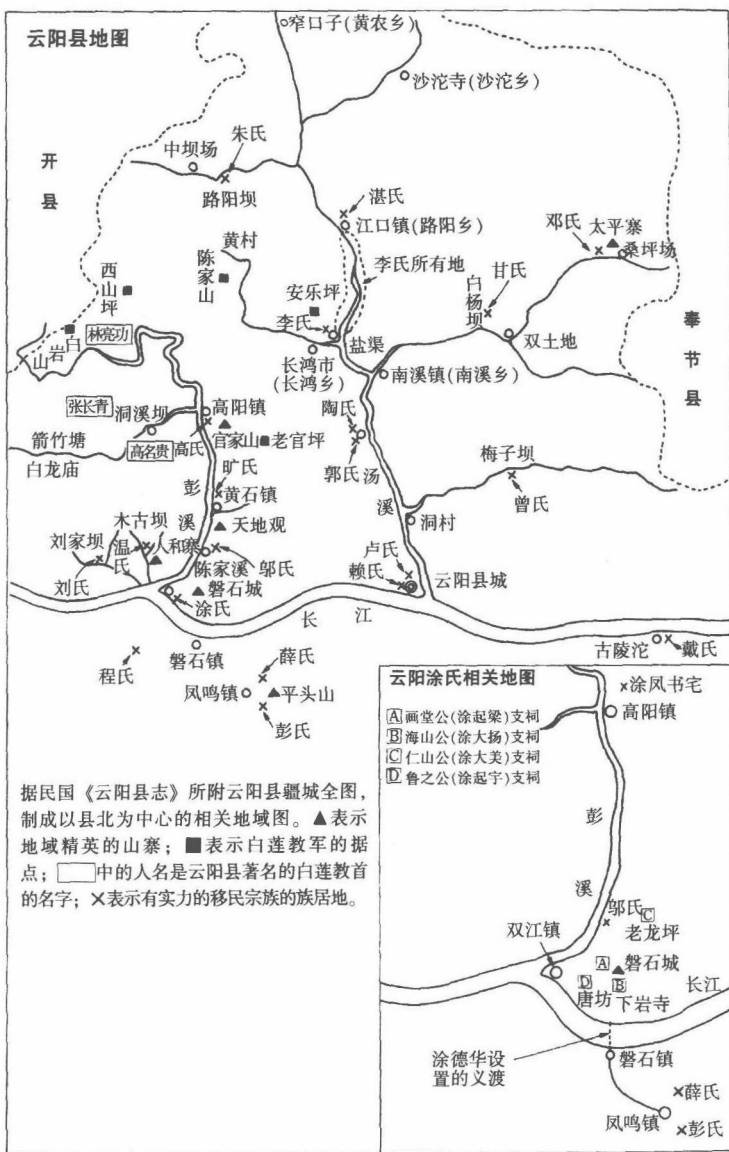
1983 年毕业于北海道大学文学部。

1989 年在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完成博士后学业，任北海道大学文学部助手、千叶大学文学部助理教授等。

长江流域关连地图



云阳县地图



目 录

前 言	1
-----	---

序章——中国内地移民史的课题

——考察的开端	1
---------	---

绪 论	1
-----	---

一、开发的“技术”——唐宋时期的移民	3
--------------------	---

二、生成的秩序——明清时期的移民	8
------------------	---

三、文化装置、社会机能——移民社会与地域精英	13
------------------------	----

四、统治与造反——嘉庆白莲教造反研究史	15
---------------------	----

第一部 移民和地域整合

第一章 四川省云阳县

——嘉庆白莲教造反前夜的移民社会	25
------------------	----

引 言	25
-----	----